

书海经筹记

李迺扬
著

.03

文津出版社



本书作者



长春教育学院“李氏文庫”揭幕，贈書者李延揚（左二）
與長春市副市長王福林（左三）剪彩



李延和院長在“李氏文庫”揭幕式上致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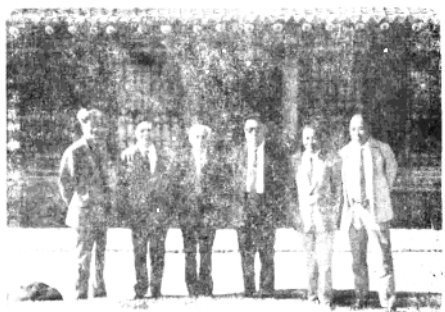
吉林美英日学院成立，李延和院长、李廷扬教授、王尔桐董事长、卢忠副董事长（自左至右）在晚宴上



李廷扬(中立者)在吉林大学讲学。讲题：泛说东洋史学



西北大学授予李延扬名誉教授，张邕之校长(右)为李延扬授予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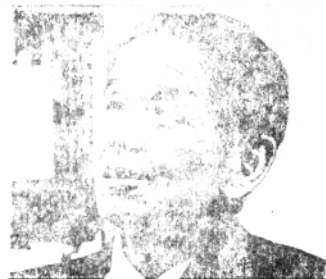


访问呼兰萧红故居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博士



日本禅学研究所所长柳田圣山教授





日本汉学家冈田武彦博士(左)与他的老师田中正雄博士



李延扬(左)与竹内实教授在交谈

代 序

日本人的生活与文化是多采多姿的，其长处往往就是短处，其美点有时就是缺点，日本人习以为常，不加自觉，倒是外国人多有发现。

生活在气候多变化的四季中，风景虽然美丽，却经常有火山爆发的威胁，再加上资本主义工商业竞争的激烈，安逸与恐怖，富裕与贫穷交织，经验的累积，就产生了日本文化的特质。日本人执著于自己文化的传统，又能摄取外来文化而发展新科技，此种国际文化交流，自然反会发生倒流现象，供外国应用，而使日本人趾高气扬。

举例来说，日本人同友人外出乘电车，自行买票，到餐馆进餐也是分摊；中国人看来似乎不近人情，其实是很合道理。

再如夫妻吵架，日本人多半动口不动手，尽量不在孩子面前出丑；中国人却极端放肆，发起威来，四邻不安，还让孩子评理。

有一对外国夫妇到日本人家做客，临别，女主人再三留客人用餐再走，客人见主人的诚意难却，于是回转身再回来，结果弄得女主人十分尴尬。岂不知日本人向有反

话正说，假戏真作的应酬习惯，外国人不知入乡问俗，就会闹大笑话！

笔者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中年以后在东瀛经营出版文化生意，日常接触的都是日本知识分子，所以对于日本人的性格和生活多所理解，因此写成《书海经筵记》，文章是用各种体裁加以报导，深入浅出，不失知识性、趣味性，希望国人欣赏。笔者学疏才浅，仍祈博雅专家不吝指教！

八十三叟

李迺扬 谨识

一九九四年元旦

目 录

京都中文出版社纪实	(1)
由官场入商场	
——片断的回忆	(5)
与王云老谈书生意经	(24)
重编影印正统道藏叙录	(33)
《文选索引》刊行缘起	(47)
宋元地方志丛书刊行序	(50)
中国典籍在日本之发展	
——和刻本源	(52)
中国禅学在日本的发展	(62)
朱子学的成立及其在日本的 发展	(72)

日本的出版事业	(90)
东京一瞥	(98)
京大人文学研究所对汉学的 贡献	(104)
献身于儒学的师徒	(108)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 与中国	(114)
泛说日本东洋史学	(124)
大和精神	(142)
日本妇女的沧桑史	(157)
日本人的衣食住行	(171)
天皇变卖富士山的波折	(181)
仁丹和征露丸	(181)

附录

半生致力儒学者自述(节选)[日]冈田武彦	(187)
-------------------------------	-------

京都中文出版社纪实

京都是日本的旅游胜地，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是世界闻名的汉学中心之一。京都大学北门前的街道书店林立。其中有一家便是我一手创办的“中文出版社”，专门出版中国文献典籍，兼营图书贸易。

中文出版社的店面还没有大公司的洗手间宽敞，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图书分类，井然有序。出版社名义上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是家庭小铺，全家总动员，社长兼工友。我原籍吉林，五十多年前留学日本，就读广岛高等师范，以后自修东北亚史，获台北文化大学附属之中华学术院哲士之荣誉。著有《韩国通史》、《俄国通史》。

1952年，我先在东京创办“海风书店”，五年后又在京都设立分公司“东海书店”（东京和京都是日本两大学区），专门出售中文书，成了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窗口。日本所藏中国古籍甚多，尤多善本，失散于本土之珍籍仍然保存在日本者不少。我就地取材，1984年又在京都创办“中文出版社”，由贩卖走向出版。为了降低印制成本，还在台北设置编印所，名“大化书局”。来日之初，我身无长物，十几年间能在国际间创办连锁的出版事业，平地一

声雷，连我自己也不胜惊讶。我的生意经不外一本《老子》：从无到有，有生万物，凡事三思而后行，今天不做，明天后悔；作了再说，就是实践历行的张本。

日本出版和发行是分工合作的企业。批发商是托拉斯组织，各有地盘，出版社一般受其控制。中文出版社却不经“书虫”之手，利用通讯、门市直售。我从未在日本报纸上刊登广告，可谓奇迹。其实，以日本人爱吃“中华料理”为例，中国菜由中国厨师调理，中华文化的精神食粮，由中国学人编印，该是顺理成章的。

回顾战前居住日本的华侨，谋生困难，受人歧视，日本人对“支那人”的传统行业，外号“三把刀”——最初跨海来日行商的山东人，卖丝绸棉用剪刀；“中华街”的理发铺用剃刀；开饭馆的用菜刀。他们的子孙受了高等教育，很多改行，却没人投身出版敢与日本同行较量。我在日本接二连三创办了文化事业，不仅为华侨职业扩大了领域，也提高了华侨在国外的地位。

作出版商容易，作出版家艰难。中文出版社远近皆知，贩卖网由京都普及全国，通往世界。经常有老师引导学生，现地选读，有时还向我请教，我都谦虚的对答。

往来东京和九州之间的日本学人，尽可能在京都中途下车，赶来中文出版社一饱眼福。因此，中文出版社被视为“路边的中国图书馆”，可当之无愧。

“中国学会”是日本学界推动教学的团体，每年轮流在中央和地方交错举行年会，特别邀请中文出版社临场展售，

日久天长，其他日本书店也多跟进。年会和书展并行，没有像样的书展，举办单位将失面子。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以儒教治国，盛行汉学。中国典籍多在日本翻刻，其中不无青出于蓝者。九州大学教授冈田武彦和荒木见晤两位博士乃宋明理学大家，为保存逐渐失散之日本复刻汉籍，主编了一系列的《和刻影印汉籍丛刊——宋明思想编》，由中文出版社出版，全集七十八册，三百多种，一气呵成，博得日本学界的赞赏。最近，冈田博士发表《半生致力儒学者自述》一书中，透露了为感谢中文出版社不计盈亏，毅然刊行和刻本汉籍，为保存日本文化遗产尽了义务，功绩非浅。

我之所以在日本有此事业之成功，受惠于天时、地利、人和。第一，国内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日本学界断炊，各方自动提供书种，委托中文出版社影印，以解书荒；第二，日本是销售中文图书的最大市场，购买力惊人；第三，书店往来无白丁，所谓“三人必有我师”，边刊边学，受人尊敬。有此三种条件，自然能一帆风顺。

不过，好景不常在，古书出笼，影印已达颠峰，海外市场已呈饱和状态，国内情形有待发展。近几年，我返乡讲学，已与教育出版界取得共识，如果能将海外事业移转国内生根，大有可为。我已捐赠国学图书万余册，运达家乡，在长春教育学院李廷和院长策划下，成立展室，命名“李氏文库”，嘉惠后学。在家乡长春发起筹办了吉林国学书院，我担任顾问，在海峡两岸尚未统一的情况下进行文

化交流。

光阴似箭，而今我已年迈气衰，不复有当年之干劲，幸有昭儿接棒，得为我一手惨淡经营的中文出版社延续，当此风烛残年，值得安慰。

由官场入商场

——片断的回忆

一、太平轮虎口余生

中国内战，南京吃紧，后方紧吃。饭馆只凭“国民大会”秘书处发的饭票，不是代表选“总统”的人，也有白吃白喝的好事。国民党政府自大陆迁台后，蒋介石效仿郑成功，积极建设台湾，号召勤王之士，于台北阳明山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下，准备东山再起。

“革命实践研究院”训练干部，蒋介石亲临主持，发现有位名叫王保共的台籍研究员，大感不快，“保什么不好，偏要保共产党”，当场改名为王保民。

蒋介石随夫人宋美龄笃信基督教，却很迷信。当大队人马撤离大陆，乘兵舰驶向台湾的途中点名时，有一位叫黎玉玺的校官垂手立正。因为此人的名字起得好，是蒋介石在台湾复职的先兆，蒋大为高兴，就在名字上用红蓝铅笔加以圈点。后来黎玉玺受宠若惊，连升三级，当了海军部

长。

效忠蒋介石并不一定官运亨通，也有马屁不正，拍在马腿上的。当八年抗战胜利，红得发紫的组织部长朱家骅，为了蒋介石偏爱，计划由国民党发起，建立一个永垂不朽的记功大鼎，却因内部派系斗争，反对派群起而攻之，说是把专制帝王的把戏，搬到民国时代重演，不啻是污染老蒋。从此朱家骅的官运江河日下，终被打下擂台。

1946年春，我由家乡长春去南京，在国民党元老吴铁城经办的“国民外交协会”作食客。

1948年，国共两军淮海战役，南京被攻陷前夕，国民党政府官员赶忙向广东疏迁。

一天早上我照常下楼用餐，侍应生很惊讶地问我，怎么未随他们一道去广东？我感到莫名其妙，原来中央大员一夜之间，全部撤离南京了。

南京的秩序大乱，街上发生了抢米风潮，连火腿店的火腿、板鸭也被光顾。餐厅不再为我记帐白吃。情况所迫，必须离开这国民党用以接待海外华侨的招待所，我很茫然。

国民党政府的纸币毛荒，来不及数，索性用秤称。投机者把金子换成纸币，到中央银行兑换金子。如此周而复始，可以赚到大钱。我也把仅有的三两金子拿到街上去卖了，就在中央银行门前排队，等待兑换。中央银行门前挤得水泄不通，到了中午就挂出了停止兑换的公告。我慌了，急忙去街上买回金子，却不到二两。投机不成失把